

中國智慧創新社會管理

這個時代充滿機遇，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正經歷規模空前的改革和發展；這個時代同樣充滿考驗，大量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日益凸顯。機遇期與轉型期重合，這片土地上，幸福與煩惱交織浮現。

近些年，一個嶄新話題閃亮出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社會管理創新。從中央到地方，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從頂層到草根，都在實踐中摸索着社會管理的創新之策。面對這道現實難題，中國的聲音讓人關注，中國的智慧令人期待。

本報記者 鄭曼玲

9月烈日下的烏坎，一片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投資100多萬元的圖書館項目已經封頂，避風港、教師宿舍樓、村道鋪設等也正啓動建設。由廣東省委牽頭援建的這十幾項基建項目，涉及自來水供應設施改造、村居綠化、排污管道修繕、學校球場及塑料跑道、航道清理等，總耗資約6000萬元，瞄準的都是困擾村民多年的生活難題。「這次援建項目規模之大、啓動速度之快，都遠遠超越了我們的預期。」烏坎村委會副主任楊茂說。

而在烏坎村委會辦公地點，一樓的村務監督委員會、副主任辦公室和安保險的辦公室裡，均有村民圍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你一言我一語地商討村裡的大小事情。

曾幾何時，村委會大樓是一個威嚴而專權的標識，村民談虎色變，往昔村委會大門雖然敞開，卻鮮有村民敢進去，「他們（村委會）開會也從來不讓我們聽。」而今，多年壓抑的參政熱情噴薄而出，村委會門廳也成爲了議事場所，門口常有村民代表和村民們現場溝通，有人稱之爲「公民論壇」。而村口公告欄上，烏坎村民生項目建設情況及土地管理情況一目了然，每個村民都可以參與對村委會的監督。村民洪瑞卿說，烏坎村正處於近年來最好的時期，新的村委會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爲村民辦了過去幾十年沒辦到的事情。

民生與民主，均在這個圍於一方的小漁村中，蓬勃生長。而這一切，距離當初村民們「揭竿而起」的「烏坎事件」爆發，僅僅一年時間。

曾經處於臨界點的烏坎事件化危爲機，爲中國社會矛盾的良性化解與新體制的和平建設釋放出善意，這預示着維穩模式開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係政府走出維穩體制困局的嘗試，具有標誌性意義。



▲ 2008年6月20日，胡錦濤與網友「零距離接觸」

或許，烏坎事件正在徐徐落幕，但那只是一個故事的結束。它所折射的中國現實矛盾與解決路徑凸顯在時代的舞台上，公眾甚至期待，烏坎事件會是又一次大變革前夕的序曲。

經過新中國6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從吃不飽肚子發展到總體小康，從一窮二白、受人欺凌的國家躍升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績世界矚目。然而，隨着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也隨之出現。

社會管理與時俱進

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認爲，在經濟體制改革、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推動下，中國經濟結構已經達到了工業化社會中期階段水平，但社會結構明顯滯後於經濟結構，呈現「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狀況。

自世紀90年代起，隨着國企改革的推進，中國城鄉結構、就業結構、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介紹，在城市就業總人口中，「單位人」已由過去佔95%以上下降到現在的25%左右，原有的單位管理網絡弱化，而新的社會管理網絡還不夠健全。另一方面，中國各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差距及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呈不斷拉大的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土地徵用、城鎮房屋拆遷等領域的社會矛盾易發高發；因勞資關係、醫患糾紛、環境污染、城市公共服務管理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隨着人們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

▼ 烏坎事件預示着社會管理模式開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具有標誌性意義



▲ 孫志剛以生命促成收容遣送辦法廢除



► 2011年6月10日，廣州增城大墩村因村治安隊員與擺攤的四川籍孕婦發生爭執，引發民眾與治安隊糾紛。事件發生後，大墩村加強社會管理



▲ 因上訪被打擊報復送去勞教的「悲情母親」唐慧（右）受到媒體關注



不斷增強，預防和處置矛盾的難度明顯加大。」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則認爲，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把社會建設擺到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十分及時、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事實上，中央高層對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性早有認識。中共十六大以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日益成爲執政之要。2004年6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社會管理創新」的概念，十七大提出「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更提出要「加強社會管理能力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機制」。

近年來，社會管理創新的內涵更加豐富，其包含內容和範圍進一步擴大。從傳統的「整治命令」思維，到「寓管理於服務之中」；從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運用社會力量，形成社會合力；從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視運用經濟、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綜合管理，10年來，圍繞着「創新」，中國的社會管理不斷與時俱進。能否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民根本利益，早已成廟堂與江湖間的堅定共識。

「我的心情既高興，又難過。」唐慧走出湖南株洲市白馬垅勞教所，聲音細得跟蚊子飛過一樣，雙手緊緊握在一

起。2006年悲情母親唐慧曾因11歲女兒樂樂被迫賣淫100餘次而憤然上訪，一個幸福的家庭從此陷入飄搖。在唐慧的不懈堅持下此案驚動高層，冤情才得以昭雪。然而僅僅過了兩個月唐慧就被打擊報復並送去勞教，事情一經曝出國人震怒，在媒體的強大壓力下，唐慧得以釋放。

這一次，民意得到了回應。唐慧纖弱的嗓音背後，是民眾洪亮的發聲。

9年前，孫志剛卻沒有這份幸運。在廣州街頭，他被當作「三無人員」收容，卻再也沒有機會走出來。他以生命的代價，引發社會的討論，最終促成實施21年的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

公眾知情權受重視

可以說，孫志剛之死是公民權利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他墓誌銘上的話發人深省：逝者已逝，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爲鑒，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

所幸，公權力對於公民權利的敬畏，成爲行政「糾錯」的契機。在孫志剛走後，「外來人員的基本權利日益得到重視。如今同樣是在廣州，一系列「外來工新政」正在漸次推開，「孫志剛們」已經不必懷揣太多關於「身份」的恐懼。他們當中，有人當選了人大代表積極參政議政，有人考取公務員獲得上升通道，還有人得到政府「圓夢計劃」資助，贏得升學深造的機會。2010年，廣東省政府在全省範圍內推廣積分入戶制，至今共有30.7萬名異地務工人員入戶城鎮，爲這一群體打開融入城市的一扇門。

與此同時，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中，公眾知情權、參與權和決定權愈發受到重視。2008年頒布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各級人大「開門立法」，

政府部門召開公共事務聽證會成爲常態，「三公經費」逐步公開，民眾實現了內容廣泛的當家作主。人們看到了政府與社會不斷磨合，看到了公權力對公民自由和公民社會的日益尊重。

回首十年，儘管每一滴進步都可能償付出一些代價，但不可否認，政府社會管理的智慧一直在扎實積累。「捍衛基層」，注定了不是高蹈的姿態或喧囂的口號，而是卓有成效的治理舉措。

一切彷彿庖丁解牛，順勢而爲，而又破舊立新。

總書記也成了網友

「朋友們，大家好！」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面對網民發出的第一聲問候。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來到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網民在線交流。胡錦濤說，強調以人爲本、執政爲民，因此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都需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通過互聯網了解民情、匯聚民智，也是一個重要渠道。

胡總書記親自「觸網」，對於推進中國網絡問政的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輿論普遍認爲這是網民地位及其話語權獲官方認可的開始。重視網絡表達、傾聽網民心聲，正是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進一步落實。

而從2009年至201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連續三年在全國兩會前夕與網友「勾指相約」，回應的話題幾乎涵蓋了經濟社會生活的熱點。溫總理表示，一個爲民的政府應該是聯繫群眾的政府，與群眾聯繫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是利用現代網絡與群眾進行交流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只有20年歷史的互聯網，給傳統中國人帶來的，除了生活方式的變革，更有執政理念的更新。在中央高層以實際行動支持網絡問政發展的前後，一些地方「一把手」也以不同方式與網民交流互動，主動了解網民所感、所思和所需，並將聽取到的意見建議指導現實工作，取得良好的社會回響。

2009年4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主動與12名網絡「意見領袖」對話，此後「南方民間智庫」應運而生，政府和網民間有了更有效的交流平台，網絡問政提升到更深層次。從2008年至今，汪洋已經五年五會網友。無論是鼓勵「放肆」發言，還是「允許群眾罵娘」，汪洋對待網絡意見的開放態度得到媒體廣泛認可。

對政府而言，網絡問政加快了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進程；對公眾來說，網絡問政提升了政治參與熱情與能力。公眾以最便捷的方式參政議政，政府得以反思政策得失，及時化解社會矛盾，並在與公眾的互動中逐步轉變職能，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可以說，網絡問政促進了中國民主政治不斷前行。

政府公眾良性互動

一個國家的進化史，亦是一部民意的成長史。和諧社會的塑造，不僅要靠政府的開明與自覺，更需要公民精神的孕育和萌芽，它們是民主政治的一體兩面。近年，中國民眾更加勇於和敢於發出自己的聲音和評判，政府和民眾在良性互動中共同成長——政府學習對話，避免簡單處置的傾向；公眾學習維權，生成理性的社會力量。

2011年5月，女大學生區佳陽向廣州市建委申請公開廣州「1.5億光亮工程可行性報告」，同時發出「徵集1000大媽指撥廣州建委」的倡議，獲得可愛外號「拇指妹」。奔波兩月無果後，區佳陽向廣州市發改委送去了「皮球」，給廣州市建委送去了「大鴨梨」。最終，廣州市建委負責人親自見她，並向她公開了可行性報告。

這樣的事情並非個案，區佳陽所在的廣州，公民行動此起彼伏。實名舉報出租車行業「茶水費」秘密的「老王」因爲不滿廣州市交委的調查結果而向其送了兩袋皮球，廣州高中生陳逸華在公共場所舉牌反對花巨資統一改造地鐵車站，被稱爲「舉牌哥」，由此引發了全城對於地鐵翻修的大討論。與以往動輒上訪、跳橋、堵路等方式相比，當下「公民行爲藝術」更加溫和，帶有現代都市的幽默，同時關注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

與此同時，民間公益活動蓬勃發展，由內地數百位記者共同發起的免費午餐項目，在踐行慈善的同時，還促進了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在它開展半年後，國務院決定啓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中央每年撥款160多億元提供營養膳食補助，政策惠及680個縣（市）的2600萬名在校學生。

可以看見，權利意識、平等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越來越深入公民心中，這些「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對傳統施政模式產生了巨大衝擊。他們不做滿腹牢騷的批評者，而是付諸實踐的建設者，釋放善意，凝聚共識，實現夢想，齊心協力去彌合社會裂痕。

有人說，近十年民意進入了青春期。它就像一個年輕人，不夠成熟但是活力四射，有些莽撞但是勇氣可嘉，以恣意汪洋之勢奔湧而出，越來越深入地介入到國家政治生活中。

因爲大家清楚，你不沉默，這個國家才真正發聲；你有智慧，這個國家才更有底氣。